

# 從權力技術到美學修養： 關於傅柯理論發展的反思

何乏筆 (Fabian Heubel)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本文思索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在傅柯 (Michel Foucault) 理論發展中的關係，並藉此切入美學修養的討論。對傅柯研究而言，此角度相當特殊，因為不僅強調權力分析與生存美學的內在關連，更認為透過晚期傅柯思想轉折的反思，可深化傅柯式的權力分析。若從傅柯自己分別知識、權力和倫理的三軸心說，進行美學修養的探索，則可展開三種研究角度：一、美學修養與知識考古學的關係；二、美學修養與權力系譜學的關係；三、美學修養與工夫倫理的關係。本文集中討論第二種角度，以思考晚期傅柯理論發展中的轉折。藉由「治理性」的概念，傅柯從生命權力的分析過渡到生存美學的主題。經過這樣的理論運作，生存美學乃可涉及治理自我的美學工作，使自己的生命成為藝術品的活動。不過，儘管傅柯透過治理性的概念，連接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在他人生命上的工作與自我在自己生命上的工作，但他並沒有充分發揮權力分析對思考生存美學及自我修養的重要性。因此，本文試圖思考應如何進一步發展權力技術與美學修養的關係。

**關鍵詞：**美學修養、生命權力、生存美學、自我技術、傅柯

## 壹、生命與技術

本文思索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在傅柯 (Michel Foucault) 理論發展中的關係，並藉此切入美學修養的討論。對傅柯研究而言，此角度相當特殊，因為不僅強調權力分析與生存美學的內在關連，更認為透過晚期傅柯思想轉折的反思，可深化傅柯式的權力分析。若從傅柯自己分別知識、權力和倫理的三軸心說切入美學修養的探索，則可展開三種研究角度：一、美學修養與知識考古學的關係；二、美學修養與權力系譜學的關係；三、美學修養與工夫倫理的關係。本文則著重第二種角度，以

思考晚期傅柯理論發展中的轉折。

無論在寫作風格或內容表現上，生命權力概念的代表著作如《知識的意志》與生存美學的代表著作如《快感的使用》及《自我的關注》之間，具有極為明顯的差別。相關理論轉折的分析，或許可從《知識的意志》末頁的討論來加以釐清。在此，傅柯指出，「性欲」(sex)無法作為對抗權力的根據，因為知識與權力的複雜關係隱含在「性欲」之中。此關係，傅柯稱之為「性特質」(sexualité)。換言之，貫穿個人和集體的「性特質」被視為生命權力的組成要素：性特質以「欲望」(désir)為基礎，而「欲望」在生命權力中扮演重要角色。傅柯乃試圖將「欲望」的觀念回溯到基督宗教式的「欲望主體」，以及告白技術的形成，並探討欲望主體在現代脈絡下，如何被納入歐洲十八世紀啓蒙運動所開拓的後基督宗教性慾論述。對傅柯而言，「性/欲」(sex/désir)<sup>1</sup>與生命權力的運作方式密不可分，因而他突破當時的一般觀點，不再主張性欲可以攻破「性特質的部屬」，反而由「身體與快感的另類經濟」切入<sup>2</sup>；他使「解放」的主題脫離對「性解放」的執著，並開展抵抗和自由的另類可能。《知識的意志》即以此願景作終結。之後，他進一步展開此一角度，深化對欲望主體的批判，並在《快感的使用》和《自我的關注》給予身體與快感的另類經濟一種令人驚訝的轉折。

《性特質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書系所引起的表面印象，似乎使人認為，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的關係基於性特質的觀念。假如性欲與生命權力密切相關，而且與性欲緊密聯結的「性解放」，皆無法脫離性特質的強制性，那麼《知識的意志》所呼籲的另類經濟，似乎在生存美學所包含之「非欲望的性活動」中才得以發展。然這樣的解釋過於簡單，因為就《性特質史》出版期間(1976至1984年)而言，傅柯在法蘭西學院課程僅在1981年詳細探討性特質的主題。此外，在《知識的意志》中已可推論，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之間的橋樑並非性特質，而是「生命」與「技術」的關係，或說：管理生命的技術。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的連接成為可能，因為兩者都將生命視為技術的對象：傅柯提及「生命的政治科技」一詞<sup>3</sup>，另又指出「生

<sup>1</sup> Michel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 (Paris: Gallimard, 1976), p.208; 英譯本: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157; 中譯本: 《認知的意志》，余碧平譯，收入《性經驗史》(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118。

<sup>2</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211 (英 159, 中 119)。

<sup>3</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191 (英 145, 中 108)。

命技藝」(techne tou biou) 的說法<sup>4</sup>。由此觀之，生命一方面作為權力技術的對象，即在身體的規訓上與在人口的調節上（或說在身體的生命上與在人類生命上）產生影響<sup>5</sup>；另一方面，生命 (bios) 也作為「美學藝術品」的材料。

就傅柯整體的理論發展而言，應如何理解生命與技術的關係？晚期傅柯回顧自己理論發展時指出，「真理」的主題橫跨知識、權力和倫理三軸心，貫穿其一生的研究。然傅柯思考真理問題的方式與歐洲形上學傳統大為不同：他以探索「真理的歷史」取代永恆真理的追求。自古希臘以來，歐洲哲學特別關注，對世界的真實認識與認識在自我之中，具有何種共同的根據。一般的回應多主張靈魂與真理（以靈魂作為真我），以及主體與認識之間的關係。以此為背景，傅柯對真理與主體的關係，展開多重層次的批判分析。若以真理的主題貫穿傅柯理論發展的三領域（即「真理構形的歷史」、「真理的諸種政治」及「真理的倫理」<sup>6</sup>），則可推論，研究真理的歷史所發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真理與主體的關係，及其劇烈轉折之上。他的主體觀乃從主體概念的尖銳批判，以及對「去主體化」的讚美，發展到另類的「主體化」概念。<sup>7</sup>

然而，生命與技術的關係，在上述的理論歷程中，發生何種作用？筆者認為，此關係伴隨著真理與主體之關係的演變，並能夠就此關係的發展，提供深刻的分析角度。傅柯避免將生命的肯定等同科技的批判，並非以「技術文明」為現代異化的主因。由此可顯示傅柯對科技 (technologie) 一詞的奇特甚至是挑釁的用法。在論及「權力的科技」或「自我的科技」時，他將科技視為科學知識與技術實踐的關聯，並認為知識與技術的關係不僅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具有關鍵意義，另對人文科學也極為重要。晚期傅柯透過技術或科技的概念，連接反人文主義與啓蒙的現代性。在早期，他已表達相似的主張：

---

<sup>4</sup>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V, édition éta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Daniel Defert et François Ewal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Jaques Lagrange (Paris: Gallimard, 1994), vol.IV, p.390; 英譯本收錄於: "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I,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ondon: Penguin, 2000), p.260; 中譯本收錄於: 德雷福斯、拉比諾著: 《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錢俊譯，臺北: 桂冠圖書公司，1992，頁 301。

<sup>5</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192 (英 146, 中 108)。

<sup>6</sup> 參閱 Frédéric Gros, "Michel Foucault, une philosophie de la vérité", in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ie, Anthologie établie et présentée par Arnold I. Davidson et Frédéric Gros* (Paris: Gallimard, 2004), p.11。

<sup>7</sup> 參閱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vol. IV (no.311), p.43 (英 241)。

我們這一輩的人，當前所作的努力，不在於突顯人與知識或技術的對立，反要精確地指出，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存在方式、直到我們最日常的存在方式，都作為同樣系統組織的部分，因而與科學和技術的世界屬於相同範疇。<sup>8</sup>

上述引文來自 1966 年《詞與物》出版後不久的訪談。其中，生命與技術的連接，反應在日常生活、思想和存在方式與科學技術的交錯上。傅柯以「激情的冰冷」駁斥虛偽的「人道溫暖」，因為後者正指涉生命與技術的分裂：儘管生命與技術的關係影響日常生活的所有一切，而人道主義則阻礙相關的反思。由此可初步理解，「知識考古學」時期的傅柯，已特別注意生命與技術的關係。此關係也延伸到 1970 年代初期以來的權力系譜學，使之朝向身體與權力技術的探討而發展。

## 貳、從權力技術到自我技術

傅柯認為，現代歐洲在權力結構上的重要轉變，是從「主權權力」到「生命權力」的發展：「生命」逐漸成為政治技術的場域。依此，自十七世紀以來，「針對生命的權力」(pouvoir sur la vie)<sup>9</sup>出現了兩種互為連接的形式：一是諸種「規訓」(disciplines)或人體的解剖政治；一是諸種「調節控制」(contrôles régulateurs)或人口的生命政治。「身體規訓」與「人口調節」這兩種權力技術的目標，都在生命的管理(gérer la vie)。新權力模式著重力量的生產、增長及條理，而不是追求力量流動的阻擋、屈服或破壞。<sup>10</sup>在歷史上，生命權力以原始的、包含生殺大權的「主權權力」為對比。傅柯並非主張，主權權力的原始形式在現代脈絡下徹底消失，而強調兩種權力模式的比重逐漸轉移：從古老主權權力的「使死亡或讓生活」(faire mourir ou laisser vivre)，轉移到生命權力的「使生活與拋入死亡」(faire vivre et rejeter

<sup>8</sup>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vol. I (no.37), p.518.

<sup>9</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182 (英 139, 中 103)。

<sup>10</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179 (英 136, 中 101)。

dans la mort) <sup>11</sup>的模式：

沒有什麼比十九世紀以來的戰爭更加血腥。相較於在此之前的政治機制，從沒有對自己的人民實行過類似的大屠殺。但是，這一巨大的死亡權力……現在卻被一種積極地管理、抬高、增多生命的權力，並對生命行使明確控制和整體調節的權力所補充。戰爭不再以保護君主的名義發動，而是為了確保大家的生存。於是，有人以人民生存的必要性作為幌子，煽動全體人民起來相互殘殺，屠殺成為維持生存最根本的條件。以管理生命和存活、身體和種族的名義，大屠殺成為生機的。如此多的政治機制可以發動如此多的戰爭，殺死如此多的人。<sup>12</sup>

對傅柯而言，在生命權力的條件下，行使主權權力的殺傷作用無法暢行無阻，便是現代種族主義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藉由種族主義，主權權力重新確立其正當性。從他的理論發展來看，生命權力的雙面構想，在相當程度上擴展了《規訓與懲罰》在權力技術方面的分析範圍。

分析規訓權力的核心問題在於，權力如何透過各種規訓技術，促進個人身體的「規範化」(normalisation)。相關權力分析的主要材料，乃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所逐漸發展及普及化的規訓機構，如監獄、軍隊、學校、工廠等。規訓技術的研究並非將「規訓」化約為個人生命的壓制，而已開始注意，權力如何積極地增強和運用個體人力。《規訓與懲罰》已著重權力技術的生產作用，但權力的壓迫面卻仍然比權力的生產面更為突顯（這是許多學者批評傅柯權力觀過於消極、身體觀過於被動的理由）。然在《知識的意志》中，傅柯對此問題的反思更加深刻：探討權力生產作用的焦點從規訓「身體」的技術轉移到管理「生命」的技術，並以「性特質」作為兩者之間的中介者。由 1976 年的法蘭西學院課程《必須保衛社會》可知，傅柯在出版《規訓與懲罰》的同時或不久之後，已開始思考所謂「非規訓的新權力技術」。<sup>13</sup>

<sup>11</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181 (英 138, 中 102)。另可參閱《必須保衛社會》的說法：「使死亡或讓生活」(faire mourir ou laisser vivre) 以及「使生活與讓死亡」(faire vivre et laisser mourir), in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5-1976)*, édition éta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François Ewald et Alessandro Fontana, par Mauro Bertani et Alessandro Fontana (Paris: Gallimard/Seuil, 1997), p.214; 英譯本：“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241; 中譯本：米歇爾·福柯著：《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228。

<sup>12</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p.179-180 (英 137, 中 101)。

<sup>13</sup>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216 (英 42, 中 229)。

「非規訓的新權力」一語顯然是指《規訓與懲罰》權力觀的調整甚至修正。在此轉變的過程中，「規範」(norme)的概念均可涉及身體的規訓化與人口的調節。如此，規範化的社會並不等於普及化的規訓社會，更能容納規訓的規範與調節的規範，並能擴展有關權力與生命的思考：

如果說，在十九世紀權力佔有了生命，或至少在十九世紀權力掌握了生命，那也就是說，權力通過規訓科技與調節科技的雙重遊戲，終於覆蓋了從有機因素到生物因素、從身體到人口的全部。如此，我們所處的權力掌握身體和生命，或說掌握整體生命，包括身體的一極與人口的一極。<sup>14</sup>

在此理論發展的階段，傅柯試圖透過「規範化」概念來面對「規訓」的不足。但當時，他仍未開始使用「治理性」的概念，因而難以釐清規訓與調節的關係。他透過「規範化」概念來掌握兩者，但有時仍然強調「規範化的社會」以「規訓的規範化」為核心<sup>15</sup>。由此可知，傅柯在思考生命與權力的關係上所面臨的困難。值得注意的是，《必須保衛社會》一方面強調身體與生命的對比<sup>16</sup>，但另一方面將身體的規訓與人口的調節都歸屬於廣義的「生命」。有時，他又藉由死亡與生命的對比分別「兩種權力體系」，即「對死亡的主權」與「生命的調節」。<sup>17</sup>在此區分之下，「規訓」被包含在生命調節的範圍內。上述的討論顯示，傅柯法蘭西學院的課程具有高度的試驗性質：從中可窺見概念形成的過程，思想的生成流變。傅柯核心概念的形成過程相當複雜，值得深入關注，但筆者在此無法投入概念史的研究，只要透過權力概念的發展，初步釐清生命與技術的關係。在生命權力的框架下，此關係乃是指對個人和集體「生命能量」的技術性工作。

在討論權力、生命和技術的過程中，對自己生命的美學工作逐漸受重視。雙面的生命權力（即針對身體和針對人口的權力），被更具理論彈性的「治理性」（gouvernementalité）概念所取代。傅柯以治理性的概念連接「治理自我」（gouvernement de soi）與「治理他人」（gouvernement des autres）所包含的生命技術。

<sup>14</sup>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225-226 (英 253, 中 238)。

<sup>15</sup>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35 (英 39, 中 35)。

<sup>16</sup> 可參閱《必須保衛社會》的相關說法，如「身體的規訓科技」、「生命的調節科技」等。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222 (英 249, 中 234)。

<sup>17</sup>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221 (英 249, 中 234)。

如此，他以驚人的理論寬度和厚度反省「生物現代性」(modernité biologique)<sup>18</sup>，試圖面對現代性的弔詭，如創造性與破壞性、生活的美學化與集中營死亡政治的盤根錯節。換言之，現代的生命權力既要控制又要最大化個人和集體的生命能量，但大量增強人類整體創造力的同時，破壞力也不斷地隨之而暴增：跨越生物現代性的門檻以後，人類的生命和存活本身成為問題。在個人的層面上，現代的管理技術越來越細膩地介入「生命資本」或「人力資源」的控管和剝削；在集體層面上，核戰爭和生態災難的危機，將以集體死亡威脅區域的人口，甚至整體的人類。

傅柯透過規訓與調節的雙重技術，說明既能控制又能增強的生命能量及其運作方式。藉此，不僅開展對「性特質」及「壓抑預設」的獨特分析，也進一步透過生命權力的概念，探索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在生物現代性中的關鍵角色。就他而言，無論在身體的層面或在人口的層面上，生命權力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不可或缺的要害，因為它的生產機制，既需要成長和增強，又必須確保人的順從和可用性。因此，資本主義所要求的生命技術，必須達成生命能量既能增加又能屈從的效果。<sup>19</sup>由此出發，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課程中，對「自由主義治理性」及「自由主義的治理科技」進行詳細分析。藉由現代種族主義的介入，以生命力既增強又控制的狀態為核心的治理性，便觸及生命與死亡的絕對辯證：「他人的死亡，劣等種族、低等種族(或退化、非正常種族)的死亡，將使整體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和純粹。」<sup>20</sup>

將其他種族視為對「自己」種族的威脅，隱含著增強自己種族生命力的觀念。如此，消滅生命便成為現代權力的一部分。傅柯進一步指出，處於生命權力模式的國家，若要行使主權權力的殺傷作用，必須藉由種族主義的操作來加以確保<sup>21</sup>：

在納粹社會中，就有了這個奇特的情況：這個社會徹底普及化生命權力，又同時普及化殺人的主權權力。這兩種模式，其一是經典的、原始的，給予國家對國民生與死的權利，其二是圍繞規訓和調節所組織起來的新模式，亦即生命權力的新模式。<sup>22</sup>

生命權力的極端案例與生存美學如何連接？如何從以生命為對象的權力技術轉

<sup>18</sup>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188 (英 143, 中 106)。

<sup>19</sup> 參閱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p.185 (英 141, 中 105)。

<sup>20</sup>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228 (英 255, 中 240)。

<sup>21</sup> 參閱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230 (英 258, 中 242-243)。

<sup>22</sup>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232 (英 260, 中 244)。

移到自我技術？此處「治理性」概念扮演關鍵角色。傅柯在 1978 年以《安全、領土、人口》為主題的課程中，發展《必須保衛社會》所開拓的新權力分析，促使研究視角及核心詞彙的轉化。「治理性」概念的引入，以及「治理的藝術」一詞的使用，使得研究對象的寬度再次擴展，同時也包含了看似毫無關聯的主題，如基督宗教的「牧師權力」和「良心指導」，或現代的「警察」概念。於此萌生傅柯在 1978 年之後所探討的兩種治理技術：「自我的科技」與「個人的政治科技」<sup>23</sup>。由此，從生命權力的技術到生存美學的技術的過渡可見一斑：生命與技術的關係作為治理活動的構成部分，因此治理性可扮演控制與創造之間的中介者，而容納調節與增養生命的雙重作用。傅柯乃試圖以治理性的概念解決在權力分析的脈絡下無法處理的問題，尤其是權力與規範化的關係問題。由此可理解為何傅柯理論發展，出現以治理性概念取代權力概念的傾向。他似乎越來越清楚意識到，權力概念難以擺脫「規訓」的聯想，於是放棄兩種權力技術的分辨；或說，他以「規範化」表達規訓權力與調節權力的關係，並使得治理的活動能包括個體和集體的面相，貫穿既控制又生養生命的管理。從治理藝術或治理技術的說法開始，傅柯便投入科技、技術和藝術等詞彙的語言遊戲。生命技藝（*techne tou biou*）乃依據希臘文 *techne* 一詞的雙重意涵，表達藝術與自我技術的關係。經過這樣的理論轉折，生存美學所追求的「自我創造」便涉及治理自我的美學工作，使自己的生命成為藝術品的活動。不過，儘管傅柯透過治理的概念，連接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人在他人生命上的工作與自我在自己生命上的工作，但他並沒有充分說明權力分析對生存美學及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因此筆者認為，由既能控制又能增強生命的雙重活動，探討權力技術與美學修養的關係，可導致重要的理論突破。

## 參、生命的肯定與創意工夫的誕生

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權力意志的概念以來，生命、權力和力量的關係，成為哲學的重要主題。在現代歐洲的「力量哲學」（*philosophie de la force*）中，權力概念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而且對藝術和美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尼采哲學所創立的思想模式，在傅柯的著作中以不同形式重現。就兩者而言，生命、權力和力

---

<sup>23</sup>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及“Political technology of individuals”乃是傅柯 1982 年在美國所發表的講座主題。參閱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Patrick H. Hutton, Amherst: Massachusetts UP, 1988。

量的關係引起「美學」的深刻轉變，深化力量或能量的美學含義。<sup>24</sup>尼采批評「否定生命」的哲學和宗教，尤其基督宗教的「虛無主義」，反應「生命」的歷史轉折。美學成爲「肯定生命」的主要領域：對身體、表象、生成流變的肯定，逐漸取代傳統形上學對這些面向的藐視。換言之，此一轉折就既是美學的又是批判的修養觀，奠基了歷史文化條件。爲了釐清修養哲學的批判意涵，筆者將修養分爲「修」與「養」兩面向，藉由「修治」與「生養」的辯證，切入修養論的探討。

如上文所指出，傅柯對權力技術的分析，含有從「規訓技術」到「調節技術」的發展趨勢。筆者將試圖以相似的分析角度切入「修」與「養」的關係，強調前者重視自我的修治，即要求欲望的克制，以及自我主宰的能力，而後者重視自我的生養，即追求生命能量的培養、增強或解放。依此，「修養」可理解爲自我主宰與自我生養的辯證過程。自古以來，歐洲哲學著重理性知識與自我控制的關係，但到了二十世紀，對啓蒙的反思，便嚴厲批判理性控制的黑暗面。然而，傅柯對主體性的討論不再受限於理性控制的譴責，不僅關注修養的修治面，且著重身體的「規訓」與「非規訓」的生命管理之間的複雜關係。他甚至強調，非規訓的生命管理在現代脈絡下，已逐漸獲得主導地位。換言之，從生命權力到生命治理的發展，在個人層面上，意味著修養論的反轉：由以「修」爲重，以「養」爲輕的模式，轉到以「養」爲重以「修」爲輕的模式。更精確地來說，現代修養論發生從「修養」到「養修」的轉化。筆者認爲，此一轉化呼應從精神修養到美學修養的發展動力。

就上述的反轉而言，尼采「價值重估」的概念可提供有效的分析進路。在歐洲修養哲學的歷史中，「價值重估」的主張代表革命性的轉折：「向上修養」的批判與「向下修養」的浮現。對歷來的修養論而言，後者是難以想像的。然而，對身體、感性和欲望的肯定，突破了傳統的兩層主體性，即破除了精神與身體、清明的理性自我與混濁的感性自我之間的等級結構，不再由此理解自我與自我的關係。自我的「雙重化」後，精神修養的向上提升以擺脫或轉化劣等自我爲目標，但自從十七世紀以來，歐洲修養史逐漸出現另一種可能性，即肯定物質、身體、感性、欲望的美學修養，或說「向下修養」。值得注意的是，美學修養的出現與唯物論的發展息息相關，但卻也逐漸走出唯物論的狹窄框架，而分化出介於物質與精神之間的「能量」

<sup>24</sup> 在十八世紀的啓蒙思想中「力量」(Kraft)和能量(Energie)概念相當受重視，也成爲美學理論的範疇。參閱 Michel Delon, *L'idée d'énergie au tournant des Lumières (1770-1820)* (Paris: PUF, 1988); Christoph Menke, *Kraft –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hrop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8)。

向度。<sup>26</sup>

從尼采到傅柯，「道德系譜學」涉及形上主體的批判。尼采給予「形上學」一種道德的解釋，而將之理解為價值等級的理論基礎。形上主體內部所含涉的權力關係，乃是優等自我對劣等自我的主宰關係。然對形上學的批判也瓦解了主體性內部的等級秩序。更且，尼采所謂價值重估不受限於顛倒精神與身體的位階（以身體的優先性取代精神的優先性），反而初步開展兩者的新關係。就此，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討論尼采對「柏拉圖主義的倒轉」時，清楚指出：

無論是感性領域的廢除，還是非感性領域的廢除，都是沒有必要的。相反地，倒是需要消除對感性領域的誤解和詆毀，同樣也要消除對超感性領域的過分抬高。當務之急在於透過感性與非感性的新等級秩序，為感性的嶄新解釋開路。這個新的等級秩序並不是要在舊的秩序圖示（Ordnungsschema）之內做簡單地顛倒，並不是要從現在開始高估感性領域而低估非感性領域，並不是要把處於最低層的東西置於最高層上面。新的等級秩序和價值設定意味著：改變秩序模式。<sup>27</sup>

海德格所謂「秩序圖示」的改變可說明，走出形上學的秩序模式（高估非感性領域）不等於偏面贊成反形上學的秩序模式（高估感性領域），因為如此僅陷入形上學與反形上學的無解爭論之中。若依此理解「美學」的意義，其不再受限於「感性學」的範圍，而是貫穿感性與超感性領域。美學乃不屬於形上學的，也不屬於反形上學的任何一邊，而牽涉到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平等溝通。<sup>28</sup>換言之，修養哲學進入現代性的漩渦時，面對精神主體的瓦解，以及重新調整精神與物質、理性與欲望

<sup>26</sup> 此研究進路顯然觸及修養論研究的跨文化視野，結合不同的歷史資源，尤其參考中國哲學的「形—氣—神」三元結構。此結合具有哲學上的必要性，因為此三元結構與歐洲哲學的內部發展可產生動態的呼應關係。可參閱何乏筆：〈何為「兼體無累」的工夫——論牟宗三與創造性的問題化〉，《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楊儒賓、祝平次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79-102。

<sup>27</sup>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vol.I, Stuttgart: Neske, 1998, p.212; 英譯本: *Nietzsche*, transla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vol.I), p.209; 中譯本: 馬丁·海德格爾著:《尼采》，孫周興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231。

<sup>28</sup> 一般來說，「美學經驗」（*ästhetische Erfahrung*）可包含精神面與物質面，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平等溝通」似乎超出「美學」（*Ästhetik*）概念的正當範圍。尤其漢語的「美學」翻譯因為其中的「美」字便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紀的主流意義，難以傳達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理論的發展，更難容納「美學修養」所指的特殊意義。因此，筆者確實意識到「美學」一詞的不足，但如何取而代之以的問題，遠超出本研究的範圍，於此暫而不論。

之關係的挑戰。筆者認為，尼采爲了應對此一挑戰，拓展精神與物質「之間」的能量向度。順此發展，精神與物質可理解爲能量的不同狀態，而藉由兩者的關係，能量主體的觀念開始浮現。在現當代歐洲的批判思想中，能量主體的產生，涉及對精神優先性及理性主宰的批判（無論是馬克思式的、尼采式的或佛洛伊德式的批判皆是）。

歐洲哲學自十八世紀以來，發展了許多與能量（力量）相關的概念，如意志、欲望、衝動等。就主體與能量的關係而言，尼采和佛洛伊德顯得特別重要，因爲尼采所謂「權力意志」，以及佛洛伊德的「心理能量」（*psychische Energie*）皆涉及個體和集體生命能量的運行。於是，精神的形上學意義被淡化，同時將精神理解爲能量狀態的傾向獲得清楚的表達。此外，海德格特別關注「間」（*Zwischen*）的領域，促使現象學的相關思考。尤其德國的身體現象學強調形體與身體的區別：形體（*Körper*）是可見的，而身體（*Leib*）是指不可見的、無法觸摸到的感受。如此，精神、身體和形體便構成現象學式的三元結構。

不過，主體性從二元到三元結構的轉折，以及能量論的開拓，在歐洲碰觸嚴重的困難。尼采稱之爲「虛無主義」。就他而言，形上學的批判與虛無主義的探討息息相關。因此，海德格在《尼采》一書中一貫強調，尼采虛無主義的概念，基於「形上學」的特殊了解，即從「價值」的概念看待歐洲形上學的發展。換言之，尼采理解形上學的方式，對反省美學修養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爲由形上學與價值秩序的關係來看，修養論的本體結構（即形體—能量—精神的關係）發生「去等級化」，造成精神逐漸失去高尚價值的優越地位。只有在歐洲傳統形上學的價值結構被瓦解後，對美學修養的探索才成爲可能。

就尼采而言，現代的虛無主義意味著「最高價值的貶黜」。<sup>29</sup>但同時，虛無主義的歷史涉及歐洲哲學自古希臘時期以來的某些基本預設。尼采認爲，虛無主義的來源在於「生命」的貶低與精神價值的抬高。由形上學與價值秩序的連接觀之，價值秩序的確立等於形上學的誕生。尼采批評，哲學家一旦成爲「形上學家」，便導致哲學的「退化」。在他看來，此退化的歷史可回溯到蘇格拉底。就此問題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反思值得一提：

如果我們將形上學定義爲兩種世界的區別，即是本質與假象、真與假、

<sup>29</sup> Friedrich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Versuch einer Umwertung aller Werte*, ausgewählt und geordnet von Peter Gast unter Mitwirkung von 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 (Stuttgart: Kröner, 1996), p.10 (no. 2); 英譯本：*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7), p.9。

智性與感性的對立，那麼蘇格拉底便是發明了形上學：他使生命成為一種必須被判斷、衡量、限制之物，而使思想成為一種以高尚價值（如神聖、真、美、善）的名義所行施的衡量標準及界限。<sup>30</sup>

從虛無主義的歷史看，柏拉圖主義及基督宗教的形上學傾向，提倡某些高尚的價值，但貶黜自然的生命，因而否定了生命本身。尼采認為，形上學所指的價值等級，因為內在分裂的傾向而進入價值虛無化的歷史階段，即虛無主義的激化狀態。此一激化的經驗乃促使價值反轉的必要，嶄新價值體系的形成，並產生虛無主義與生機主義的對比。直到今日，這類的標籤仍困擾著尼采的研究。筆者在此只要強調：尼采同時批評唯心論與唯物論，於是能走出哲學的二元結構，且透過價值重估的動作，打破形上學的秩序模式。他以形上學為價值秩序的解讀，奠基了當代「力量哲學」的發展條件。<sup>31</sup>

本節由「修」與「養」的區分切入修養論的探索，進而接著傅柯有關權力與生命的思考，理解「修」與「養」的關係所蘊涵的歷史趨勢：從以修治或規訓技術為主的模式，發展到以生養或調節技術為主的模式。如此反省修養論的當代意涵，與德勒茲《尼采》一書關於價值重估的討論有所呼應：

所有價值的蛻變（transmutation）可界定如下：諸種力量開始活動起來，即是**肯定性在權力意志中的勝利**。在虛無主義的統治下，否定性作為權力意志的形式及基礎；肯定性屈服於否定性，它僅是次要的，意即僅作為收成及實現否定性的果實。……現在全部改變了：肯定性成為本質或權力意志本身；否定性依然繼續存在，但是如同肯定者的存在模式、如同屬於肯定性的攻擊性（agressivité）……如同伴隨著創造的全面批判。……蛻變意指肯定性——否定性之關係的這種顛倒。<sup>32</sup>

順著德勒茲對尼采的轉述，建構價值秩序的形上學，便包含權力意志：建立價值秩序的人，將以價值的建構，增強自我對自我的「權力」。<sup>33</sup>或說，將形上學的價值等級引入到自我與自我的「權力關係」之中，具有「自強作用」

<sup>30</sup>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Paris: PUF, 1965), p.21.

<sup>31</sup> 參閱 Deleuze, *Nietzsche*, p.26。

<sup>32</sup> Deleuze, *Nietzsche*, pp.32-33.

<sup>33</sup> 參閱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p.16 (no.12) (英 13-14); 及 Heidegger, *Nietzsche*, vol. II, pp.86-87 (英 vol.4, p.61, 中 735-736)。

(Selbstermächtigung)。換言之，以精神力量為高尚價值，並追求身體衝動的控制，便在自我的領域中奠基文明發展的先決條件。但如同德勒茲所說，其中的權力意志，僅是以否定的形式出現，因為著重於主宰被視為低劣的生命：理性對欲望的控制屬於治理生命的消極模式，在自我與自我的關係中施行主權權力。經過肯定與否定關係的反轉後，生命力的運用不再受限於理性的控制作用，而開始以積極的創造邏輯為主導方向。就修養論而言，價值重估乃意味，調整修治面與生養面的價值秩序，使得修養透過本體結構的改革，因而讓現代意義下的美學修養成爲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價值重估的活動中，「哲學」如同海德格所指出的，並非停留在超感性的批判上，也並非陷入感性優先的片面主張，反而對傳統形上學的價值系統進行更深層的改革，擺脫唯心論或唯物論的單向抉擇。此一哲學改革乃使得能量概念在歐洲哲學中獲得「後形上學」的開展：二元的本體結構（如物質—精神、感性—理性）被瓦解，而逐漸被三元結構（如物質—能量—精神、形體—身體—精神）所取代。

就歐洲修養史來說，能量概念的現代發展，促進了不同於傳統形上學的價值結構。尼采透過對虛無主義的批判，開拓以肯定生命爲核心的自我觀。但是，他新價值的創造所伴隨的主要概念，如權力意志、永恆回歸或超人（Übermensch），卻只顯示修養哲學在價值反轉後所面臨的現代陷阱。換言之，在現代歐洲，三元本體結構的出現，呼應著創造力的開發，因此修養的過程，在個人的層面上，便逐漸從傳統的、以規訓權力爲中心的「禁欲工夫」轉到以治理生命爲中心的「創意工夫」。傳統價值秩序的瓦解，使得「向上提昇」的精神化不在是修養過程的唯一目標，反而成爲其中的選項之一。如此，修養工夫脫離精神修養的單一軌道，步入生命管理的多元實驗。

## 肆、能量美學與越界態度

康德的批判概念在主觀意識，以拯救形上學爲目的，但實際上引起了一連串激化效應，促進摧毀傳統形上學的大趨勢。他的工作奠基了尼采對形上學的批判，以及對其宗教成分的徹底否定。現在批判不再僅是要排除不正當的、缺乏科學根據的知識，更是以積極開創新可能性爲目標。由此觀之，尼采的虛無主義概念將批判的否定性推到極致（基督宗教的否定），同時也尋找虛無主義之外的另類可能。在此過程中，價值重估的活動讓批判與創造性連接，使得現代的界限哲學，從尊敬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走向無限創造的越界態度。然而，越界創造性的哲學背景涉及

「生成本體論」(ontology of becoming)的形成：存在(Sein)與生成(Werden)的關係乃成為二十世紀歐洲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順著生成本體論的展開，歐洲現代哲學中的「能量」(力量)概念進一步發揮獨特作用。然而，必須留意的是，權力意志及其複雜的歷史效應顯示，生成與能量的關係只能在「虛無主義」的負面理解下發展：在許多學者的眼裏，形上學的終結與上帝之死，等於歐洲思想甚至整個歐洲文化的致命性危機，觸及「西方的衰落」。

能量(力量)概念的現代發展與從存在的哲學到生成的哲學的過渡息息相關，同時涉及權力問題與美學領域。由權力問題切入能量轉化的哲學，影響了歐洲哲學的權力分析。在此背景下，肯定生成流變而拒斥「否定生命」的哲學才得以產生(包含傅柯的權力理論)。但同時，能量與權力的關係，在能量概念的美學衍生上，印刻了強制性的特質。直到今天，此情形決定美學與創造性的關係：越界的態度與創新的要求成為不可分割的對偶。換言之，創造性在各種生活領域中的開發，與尼采所謂價值重估是相呼應的，因為傳統形上學及其價值秩序的瓦解，構成了現代生活方式得以「創造化」的思想條件，也奠基了「能量美學」的發展方向。在此思想脈絡下，生命的精神向度與物質向度，可發生互相轉化的平等關係。精神與物質的二元對立逐漸被不可見與可見、分散與凝聚、隱藏與顯現的動態關係所取代。或說，在能量美學之中，連接本體與能量轉化的構想取代傳統形上學的對立組合(如本體與表象、智性世界與感性世界等)。

藉由上述討論可理解，傅柯對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的研究，如何呼應著尼采對權力意志與永恆回歸的探討：權力意志所指的生命概念將生命視為諸種相互爭鬥的生成狀態；針對世界變化過程的創造面與破壞面，永恆回歸都應該保持「美學」的肯定態度。然而，尼采對形上學的批判，尤其對基督宗教的憎恨，使得能量美學的萌生，脫離不了虛無主義的爛泥巴，感染強制性的越界性質。尼采對形上學和基督宗教的強烈反駁，經常落入錯誤的極端化選項：生成硬要取代存在，表象硬要取代本體、藝術硬要取代形上學、美學硬要取代宗教等等。尼采主張，擺脫現代虛無主義的唯一途徑，乃是形上學和基督宗教的徹底批判。但在此途徑中，權力、力量、能量和美學緊密交錯，造成能量美學以追求生命強度的越界態度為核心。

總之，傅柯以增強生命與強化經驗為焦點的生存美學具有尼采的色彩：生存美學的構想離不開「越界」的基本動力。在筆者看來，因為如此，尼采與傅柯的理論在發展既是批判的又是美學的修養論方面必定有所不足。為突破此不足，必須將美學修養與越界創造性的網綁加以解開，展開能量、美學和修養之間更為複雜多元的關係。因此，反省傅柯生命權力與生存美學的發展脈絡顯示，生命權力的分析所引

起的問題，仍然潛藏在生存美學的探討中，也深刻影響了傅柯對歐洲修養哲學的理解：傅柯式的修養主體，脫離不了既要主宰又要增強生命的陷阱。此處，在個人的層次上如何擺脫此強制性的修養觀，如何設想能量美學的非越界模式乃是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 參考文獻

- Foucault, Michel. *La volonté de savoir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 Paris: Gallimard, 1976.
- 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I-IV*, édition éta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Daniel Defert et François Ewal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Jaques Lagrange. Paris: Gallimard, 1994.
- Foucault, Michel.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5-1976)*, édition éta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François Ewald et Alessandro Fontana, par Mauro Bertani et Alessandro Fontana. Paris: Gallimard/Seuil, 1997.
- Deleuze, Gilles. *Nietzsche*. Paris: PUF, 1965.
- Delon, Michel. *L'idée d'énergie au tournant des Lumières (1770-1820)*. Paris: PUF, 1988.
-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 Foucault, Michel. “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I,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ondon: Penguin, 2000.
- Foucault, Michel.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 Gros, Frédéric. “Michel Foucault, une philosophie de la vérité”, in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ie, Anthologie établie et présentée par Arnold I. Davidson et Frédéric Gros*. Paris: Gallimard, 2004.
-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Stuttgart: Neske, 1998.
-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transla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 Menke, Christoph. *Kraft –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hrop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8.
- Nietzsche, Friedrich. *Der Wille zur Macht, Versuch einer Umwertung aller Werte*,

auswählt und geordnet von Peter Gast unter Mitwirkung von 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 Stuttgart: Kröner, 1996.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7.

Martin, Luther H./ Gutman, Huck/ Hutton, Patrick H.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Amherst: Massachusetts UP, 1988.

何乏筆：〈何為「兼體無累」的工夫——論牟宗三與創造性的問題化〉，《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楊儒賓、祝平次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79-102。

米歇爾·傅柯：《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米歇爾·傅柯：《認知的意志》，余碧平譯，收入《性經驗史》（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德雷福斯、拉比諾：《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錢俊譯，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馬丁·海德格爾：《尼采》，孫周興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初稿收件：2009年10月14日      審查通過：2009年11月20日

責任編輯：劉耀仁

#### 作者簡介：

何乏筆（Fabian Heubel）：

德國達姆施塔特科技大學哲學博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通訊處：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E-mail：heubel@gate.sinica.edu.tw

# From Techniques of Power to Aesthetic Cultiv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ical Turn of the Late Foucault

Fabian Heubel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reflects upon the relation between bio-power and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within Michel Foucaul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is relation and the philosophical turn connected to it, I enter the discussion of "aesthetic cultivation". This perspective is a rather particular because it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bio-power and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but, moreover, hopes to broaden Foucault's analysis of power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dynamics leading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Greco-Roman self-cultivation as an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I suppose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hree axes of knowledge, power and ethics, proposed by Foucault himself, can help to clarify the modern notion of aesthetic cultivation emerging in Foucault's late work.

It is especially the notion of governmentality which helps to bridge the seemingly incompatible aspects of bio-power and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Through this notion Foucault turned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rt of government and techniques of the self. The idea of a technique or art of life (*techne tou biou*) is based on the ambiguity of the Greek word *techne* which refers to art *and* technique. Thus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can refer to an ascetic work of self-government with ethical connotations. Although Foucault's thought shifts from bio-power to the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from the work of someone on the life of someone else, to the work of someone on his or her own life, he did not to make sufficient use of the analysis of power-relations to develop the notion of an aesthetic cultivation, which would be critical and aesthetic. This paper tries to

further open up this possibility by regarding the twofold activity of controlling and enhancing life as central problem of aesthetic cultivation.

**Key Terms:** Aesthetic cultivation, Bio-power,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Techniques of the Self, Michel Foucault